

本书荣获1999年  
世界历史协会图书奖头奖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Book Prize 1999

后浪出版公司



# ReOrient

# 白银资本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Gunder Frank

[德] 贡德·弗兰克 著 刘北成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 ReOrient

# 白银资本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Gunder Frank

[德] 贡德·弗兰克 著  
刘北成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 [德] 贡德·弗兰克著; 刘北成译.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220-10156-4

I. ①白… II. ①贡… ②刘… III. ①世界经济—研究 IV. 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4215 号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y ANDRE GUNDER FRANK

Copyright: © 1983, 1989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Ginkgo(Beijing)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BAIYIN ZIBEN: ZHONGSHI JINGJI QUANQIU HUA ZHONG DE DONGFANG

## 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著 者  
译 者  
选题策划  
出版统筹  
特约编辑  
责任编辑  
装帧制造  
营销推广

[德] 贡德·弗兰克

刘北成

后浪出版公司

吴兴元

陈顺先

何朝霞 薛玉茹

墨白空间·陈威伸

ONEBOOK

出版发行  
网 址  
E - mail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sh.com>

[scrmcbs@sina.com](mailto:scrmcbs@sina.com)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55mm × 240mm

28.5

400 千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

978-7-220-10156-4

99.80 元

后浪出版咨询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mailto: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四川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1-2017-289

## 序一 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

好几年前就听说弗兰克在撰写一本新书，要对现代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做一次总的清算。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兰尼、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都在清算之列。1998年，《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即获得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我的基本感觉是，这的确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新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这种挑战能否成立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立，它都肯定会使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一般而言，不管你持什么立场，学术界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以及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标志着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巨大断裂，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依然置身其中并且称之为“现代”的那个时代。在15世纪末，横渡大洋无疑是一件令人生畏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如果它不是象征着欧洲社会内部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质变，而且如果这样的质变没有决定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那么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航也许就不会和大致同一时期中国的郑和下西洋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然而，从来没有人怀疑是哥伦布和达·伽马而不是郑和翻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这个基本事实如此深刻地铭刻在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语言的深处，以致我们根本不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和叙述我们的经历了。

世界历史的断裂和质变同时在两个方面呈现出来：在时间维度上，标志着“现代”开始与“过去”或“传统”构成一组二元对立；在空间维度上，

标志着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the west and the rest）之间存在着本质性差异——现代的、进步的、创新的、开放的西方对传统的、停滞的、保守的、封闭的东方。这种既是现代性又是西方特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科学理性？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民族国家？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总而言之，西方为什么如此独特？如此优越？这种独特和优越的现代性是怎样从西方的躯体内部演变和进化而来的呢？它又是怎样从西方向其他地区传播和扩散的呢？而后者又是怎样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做出回应的呢？等等。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基本上是在围绕着这样一些欧洲中心主义的目的论预设建构起来的，不同的思想流派也是针对上述问题给出自己的解释和行动规划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论只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然而，不管马克思和韦伯以及他们各自的追随者是如何针锋相对的，他们的理论和解释模式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假设前提：资本主义标志着世界历史的断裂和质变；影响和决定整个世界命运的裂变发生在欧洲内部，并且是由于欧洲社会内部的某些特殊性而发生的；这两点又要依赖另外一个假设前提，即欧洲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而存在的，从而是一个合理的分析单位，也正因为如此，在它“内部”发生的变化才会如此重要。弗兰克认为，这个三位一体的假设前提构成了全部现代历史研究和社会理论的马其诺防线，他在新著《白银资本》里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要突破这道欧洲中心主义防线，看看它后面的真实世界，究竟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还是世界造就了欧洲。

与一般学者相比，弗兰克学术生涯的戏剧性色彩似乎稍多一些。他本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导师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不过，这种关系并没有演出一个名师高徒的故事，因为他激进的左翼政治立场使他无法认同而且也不见容于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结果弄得他差点毕不了业。在思想上，他更多地受到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巴兰和斯威奇的影响，特别关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欠发达状况。毕业后，弗兰克只身来到拉丁美洲（据他自己说是去打游击的），曾先后在巴西大学、墨西哥国立大学

和智利大学等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学任教，直到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将他驱逐出境，作为一名流亡者被“流放”到自己的故乡——柏林。与此同时，他的老师弗里德曼则在智利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向皮诺切特推销“休克疗法”。这十多年时间无疑是弗兰克一生中最锋芒毕露、光彩夺目的时期，在实地研究拉丁美洲欠发达的原因的同时，他还作为一名“本地人”加入了智利的社会主义政党，深深地卷入拉丁美洲的社会政治斗争。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发表的《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1967）、《拉丁美洲：欠发达还是革命》（1969）、《流氓资产阶级》（1972）、《世界性积累，1492—1789年》（1978）、《依附性积累与欠发达》（1978）等著作，使弗兰克成为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一定意义上，战后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是可以被泛称为“世界体系理论”的学术思潮的一部分，这个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主要著作有三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主要著作有《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脱钩》）、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主要著作有《帝国主义地理学》《漫长的20世纪》）等。世界体系理论基本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体，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虽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流派，但他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分析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改变了马克思《资本论》那种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型”分析，突破了“社会”与“民族—国家”之间暧昧而又含混的等同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分析资本主义实际的展开过程，尤其侧重于考察现代世界是如何围绕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把各个地区编织到一个共同的、互相联系的、不平等的体系之中的，资本积累是如何在使某些地区发达的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制造出欠发达状态的，等等。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弗兰克和阿明的研究更为直接地和第三世界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弗兰克开始与其他世界体系分析学者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其原因固然和他的政治立场的激进色彩逐渐消退或转移方向有关，但也涉及对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的不同理解。弗兰克思想历程中的这次变化是理解《白银资本》

必要的背景，因为它与弗兰克早期的研究固然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但是断裂的一面无疑更为重要。

1989年，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发表了《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间的世界体系》一书，成为世界体系理论发生分化的契机。阿布-卢格霍德提出的新观点是，在15世纪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出现之前，就曾经存在过另外一个世界体系，同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相比，亚洲在这个较早的世界体系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阿布-卢格霍德并不企图对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提出挑战，她认为这个世界体系到1350年就已解体，并且在一个世纪后由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新的现代世界体系取而代之。但是，在现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一个包括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体系这一观点，却使弗兰克开始怀疑自己一向认同并为其做出贡献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在评论阿布-卢格霍德的书评里，弗兰克提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许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世界体系，而只是阿布-卢格霍德所说的同一个世界体系的延续。然而，他进一步问道，如果这个世界体系比通常所说的早200年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它为什么不会更早一些呢？据他说，他在智利时就认为，世界体系是不可能像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那样突然降生于世的。这就是说，在现代世界体系之前，必然已经存在着某种可以称为“体系”的东西。促使哥伦布和达·伽马航海探险的动力是什么？是发现通往“东方”的新路线，而不是开始建立东西方之间的联系。这难道不恰好说明了东西方在1492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而且促使哥伦布和达·伽马航海探险的不正是这个体系的结构和动力吗？因此，不能首先把欧洲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然后再设法从它内部找到变化的根源；相反，世界体系内部的欧洲部分的变化是和整个体系以及体系的其他部分密切相关的，例如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对传统的东西方贸易通道的决定性影响。在随后的几年里，弗兰克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探讨建立一种新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可能性。这些努力的方向和结果，充分体现在1993年他（和英国学者吉尔斯）出版的一本新书的标题中——《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

简单地说，弗兰克的新理论至少包含以下几点重要的变化。第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同一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 5 000 年以前，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 500 年前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这个变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弗兰克实际上否认了“现代性”的存在。第二，资本积累过程是（世界体系）历史的推动力。弗兰克原来和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人一样，认为持续的、永不休止的资本积累是“现代”世界体系赖以同其他世界体系相区别的基本特征。但是现在，他要证明“现代”世界体系在这方面并不那么与众不同，同样的资本积累过程几千年来在世界体系中一直发挥着主要作用（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作用）。永不休止的积累是贯穿于整个世界体系历史的竞争压力。这就是说，本质上被理解为一种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用弗兰克自己的话来说，它不过是一个被编造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第三，世界体系的中心 - 边缘结构是“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和依附理论家都很熟悉的概念，它包括但不限于世界体系不同地带之间剩余的转移。现在，弗兰克认为这个分析范畴同样适用于 1492 年以前的世界体系。第四，历史的演变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循环过程，表现为世界体系内部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心和边缘周期性的置换。且不说这个新理论能否成立，单单是它的大而无当就使其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从 1993 年发表以来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弗兰克才把下一个研究目标锁定在现代早期，即 1400 年到 1800 年间的全球经济。

让人（包括欧洲人和亚洲人，也许尤其是中国人）吃惊的是，弗兰克认为这个时代（也就是从航海大发现到 18 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被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弗兰克视为世界体系“中心”的欧洲，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的和边缘的部分。弗兰克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批判传统社会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自身并没有脱离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仿佛只能在“欧洲路灯”（European street light）的下面看待一切事物，远处的东西似乎总是显得黯淡无光，同时又身不由己地



觉得现代早期发生在欧洲的那些事件光芒四射，具有开辟世界历史新纪元的意义。但是，如果人们能够真正从封闭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知识霸权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一种全球视野（globological perspective）来看世界，那么他们就会发现，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是欧洲被吸收到一个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即从欧洲内部生发出一个现代世界体系并以欧洲为中心向外扩张，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吸收到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所以，在弗兰克看来，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欧洲发生了什么，而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尤其是其领先部分亚洲以及亚洲（从而也是世界）的领先部分中国和印度发生了什么。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弗兰克在本书的第2、3、4、5章中做了详细的论述。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数百年间贵金属的生产和流通的情况，看看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哥伦布没有到达印度，但他发现了至关重要的贵金属。据经济史权威的估计，从1493年到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的85%和黄金产量的70%来自拉丁美洲。美洲白银的产量在16世纪约为17000吨，到17世纪约为42000吨，其中有31000吨运抵欧洲。欧洲又将40%即约12000吨运往亚洲，其中有4000—5000吨是直接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送的。另外有6000吨运往波罗的海地区和黎凡特，其中一部分留在当地，其余部分继续向东到达亚洲。美洲白银在18世纪的产量约为74000吨，其中有52000吨运抵欧洲，其中40%即约20000吨运往亚洲。另外，留在美洲本土的白银中约有3000吨横渡太平洋经马尼拉运抵中国。如果再加上日本和其他地区生产的白银，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贵金属流动的意义在于，某些地区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商品，却无法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所以不得不用货币来结算贸易逆差。弗兰克提出了三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需要进口商品同时却无法出口足够的商品来支付进口所需的费用？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出口自己生产的商品并且收取货币而不是其他商品？这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需要货币？最后，为什么货币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 these 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什么欧洲需要亚洲的商品，却无法用自己的商品同亚洲交换而必须剥削

美洲的贵金属？为什么亚洲可以向欧洲出口商品，却要求用贵金属支付而不进口欧洲的商品？弗兰克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贵金属和商品在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反方向运动说明了它们各自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除了美洲和非洲，欧洲与其他所有地区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和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出口美洲贵金属是它弥补逆差的唯一手段。因此，来自美洲的贵金属源源不断地转运到波罗的海、东欧、西亚、印度（直接来自欧洲和间接来自西亚）、东南亚（直接来自欧洲和间接来自印度）和中国（直接来自欧洲和间接来自上述所有地区以及日本）。欧洲的结构性贸易逆差可以从下述事实中反映出来：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出口中货物只占6%，贵金属则占94%。从1660年到1720年的60年间，贵金属占东印度公司对亚洲出口总值的87%。出于同样的理由，代表制造业和其他“出口促进”利益的英国政府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其全部出口总值中至少要包含10%的英国出口产品。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很难满足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从而不得不削减出口总额。它发现，介入亚洲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要比亚欧之间的贸易更有利可图。

以上数字是足以让外行人大吃一惊的。但它们并不是弗兰克发明出来的，甚至也不是他自己通过独立研究得出来的，而是从许多历史学家（包括亚洲学者如日本的滨下武志）的研究中综合出来的。他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它们来说明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例如，贵金属和商品在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反方向运动，是否足以驳斥停滞的、反商业的东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虚构？或者是像“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披着红色外衣的东方主义”？是否足以证明亚洲在这数百年间处于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的地位？对于社会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亚洲经济在很长的时间里比欧洲经济更为繁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问题在于人们看待这些事情的方式。弗兰克指出，马克思和布罗代尔都对欧洲之外的“其他”经济给予了一定的注意，“但只是在其巨著的第3卷里，而它们本来应当构成第1卷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对于欧洲来说，征服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并不意味着它内部诞生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或一个现代世界体系，但它确实意味着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

最终在 19 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是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这个最终结果是不能用任何神秘的历史目的论来解释的。战后几次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大论战中都有“内在”论与“外在”论两派，弗兰克认为这样的讨论完全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因为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经济都存在于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如果一定要说什么“内部”的话，如果一定要说资本主义的内在发生论的话，那也只能是在这个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内部”发生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它之外的。即使最近几十年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给了弗兰克什么启示，但他也并没有从欧洲中心主义转向亚洲中心主义。他的雄心勃勃的目标是超越任何种族中心主义，建构一种真正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和全球性社会理论。按照弗兰克的设想，这样的理论必须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它们是：生态 - 经济 - 技术之维、政治 - 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 - 文化 - 意识形态之维。在这本书里，弗兰克的讨论仅限于生态 - 经济 - 技术之维的经济方面，很少涉及其他两个维度，更不必说如何把它们整合为一种总体的分析了。但是，毫无疑问，他成功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仅就这一点而言，弗兰克也不愧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远见的学者和思想家。

弗兰克的著作不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就总体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具体的历史细节而言，都大有讨论的余地。例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还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现实？各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是否足以证明它们存在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如果说 16 世纪初的英国是世界体系中的欠发达地区，那么这个所谓“欠发达”和 16 世纪以后拉丁美洲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欠发达地区是否具有同样的性质？仅仅从经济角度论述 1400 年到 1800 年间的历史，这本身是否合理？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这样循环下去？弗兰克在告别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是否把他早期思想中最有光彩的东西也一并抛弃了？事实上，一场大辩论已经开始了。沃勒斯

坦主编的杂志《评论》（*Review*）将会就《白银资本》出一期专号，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将会做出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反应。不论结果如何，这样的讨论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能够在这场讨论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世界中无动于衷的看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燕谷

## 序 二

这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它对 1500 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做了气势恢宏的论述。作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他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与学术界多数人的通常看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广泛利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亚洲和欧洲经济史的专家的最新成果。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他的阐述并非全是新鲜的。中国和日本的明清经济史专家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农业经济自 1500 年起便越来越商业化了。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虽然意识到了商业的成长，却依然在寻找使中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发展迥然不同的关键性差异，因为欧洲的商业扩张之后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没有。与这种观点相反，有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认为，在这两个广阔的地区，共同点可能多于不同点，其中包括商人组织的发展、交通网络的扩大和改善、农业生产的改良以及手工业的扩大。弗兰克比其他学者走得更远，他提出了一个必然会引起争议的论点：中国经济拥有比欧洲经济更大的生产力。由于他引用的资料有限，这个标新立异的论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即使作者描述的中国在经济上优于欧洲的图像仅仅获得部分的证明，即使这种说法遭到否定，然而 1500 年以后欧亚许多地区之间的商业扩张运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

弗兰克从最新的学术研究中收集了有关亚洲许多地区可与欧洲相媲美的商业变化以及农业和手工业进步的大量证据。但是，他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相似的变化。在他看来，他在白银贸易中看到的商业扩张运动中的

联系才是最重要的。所谓“白银贸易”，是指欧洲为获得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商品而支付白银所导致的贸易。弗兰克不满足于对有关世界各地经济增长的学术成果做一简单的综合，他更感兴趣的是对1500年以后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做出论证。他关于世界经济联系的基本观点是十分简单的。欧洲人渴望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丝绸、陶瓷和茶叶，但是自己却没有任何可以向中国出售的手工业品或农产品。而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的渴求。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弗兰克还阐明了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对于欧洲的发展有何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中国的这种需求，我们很难想象西班牙的白银生产是否有利可图。但是，如果中国不需要白银，欧洲人就不可能习惯性地消费如此之多的中国商品。

弗兰克的这部著作向这样一种流行观念提出挑战，即认为欧洲经济的优势至少是从1500年开始的。弗兰克本人曾经是解释这种欧洲优势的两大学派之一的一位重要代表。他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论著中考察了欧洲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指出欧洲的发展与拉丁美洲的低度发展紧密相关，这两个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系列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所谓“低度发展的理论”，成为一种影响很大的有关欧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经济关系的观点的核心。另外一种解释欧洲优势的重要学派则更强调欧洲人在欧洲地区的实践活动的特殊性。在过去几十年中，这种思路获得了新的支持者。西方研究欧洲经济史的专家通过大量的论证说明，工业革命源远流长，起源于一系列日积月累的经济变革。但是，他们不再热衷于证明被他们视为欧洲特有的实践活动确实始终是独一无二的。总之，一方面，弗兰克早期的著作认为，自1500年前后起，欧洲支配的全球经济不断地扩展；另一方面，更大量的学术研究则主张，欧洲因自身的特殊性而在1500年以后在经济上与世界其他地区分道扬镳。

弗兰克现在向这两种观点提出挑战。他把亚洲尤其是中国置于1500年以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从而“扭转”（reorient）了我们观察经济变化的视角。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想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中国的经

济优势被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取代，从而进入众所周知的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明显不同的现代时期。在他的论证中，技术变革服从于需求的程度；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对于节约劳动力的技术需求不高，而欧洲人发展了这类技术，为的是更具有竞争力。他在结束这部著作时暗示，最近一段时期亚洲经济的复兴正在使这一地区恢复它在工业革命之前所拥有的那种优势地位。

弗兰克这些高屋建瓴的论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些论点是可以分别对待的。对未来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现实状况以及政府和经济领袖们的决策。1997年夏季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预测未来的增长轨迹时要小心谨慎。亚洲各地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已经使金融市场稳定下来，但是亚洲各国经济在近期或长期究竟会如何变化，分析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数人不会赞成这样的假设：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将很快被中国取代。在考虑这些未来经济变化的问题时，其实可以脱离工业革命的动力问题以及1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技术和制度变革。

在解释工业革命时，弗兰克赞成一种多元决定论的说明，即强调多重因果关系的链条。他缺少的是这些变革引起的惊奇感。当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计划过工业革命。经济变革不是某项创造新工业世界的宏大计划的组成部分。被弗兰克视为针对特定条件做出的必要反应和调整，只不过是在事实面前的各种可能行动。技术变革不仅仅是面对“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反应。技术革新和变化的“供给”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这是更加难以确定的，当这些纷繁变化纠集并影响到不同产业时尤其如此。如何解释工业革命依然是一项有待探讨的宏大课题。

弗兰克在这部著作中主要讨论1500—1800年这一时期的历史。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如何利用欧洲大陆许多地区之间商业扩张的资料来论证全球不同地区间的商业联系。但是，欧亚大陆各地商业扩张的平行运动彼此之间有什么因果联系，它们与中国用陶瓷、丝绸和茶叶交换新世界<sup>①</sup>的白银的贸易之间有什么因果联系，关于这些方面的情况我们并不总是很

---

① 指美洲。——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加，下文不再标示）

清楚的。以英格兰东南部的商业化运动和中国长江流域的商业化运动作为两个例子来说，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它们的基本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但是，与其说它们的发展变化彼此具有紧密的相关性，不如说它们以各自不同的发展体现了类似的运动。至少从分析的角度看，白银贸易和欧洲人借此购买的商品形成了一个基本上独立的交换循环系统。当然，中国江南地区的商业网络和英格兰东南部的商业网络由于白银贸易和欧洲人购买中国商品而被间接地联结起来，但是，全球性联系大概还不是我们看到的商业化运动中的关键因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对华白银贸易会是什么情况。中国很可能继续从日本买进白银。白银供给的减少可能减缓江南地区的商业扩张，尽管我们可以想象信贷和其他货币的结合也许能弥补萎缩的白银供给。至于英格兰东南部，那个地区商业化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伦敦的扩展促成的，即使中国丝绸、陶瓷和茶叶的进口大量减少，也不可能遏止这种城市化进程以及相关的市场发展。

即使弗兰克所分析的全球交换过程在逻辑上不是中国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商业化的必要条件，但是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地区确实是由这种贸易联系起来的。弗兰克这部标新立异之作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他确实成功地“扭转”了我们观察 1500 年以来的经济史的视角。他向欧洲人提出一种挑战，指出他们的重要性正在减退，他们的世界观正在失去中心地位；他也向中国人提出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重要，因此，弗兰克的著作能够帮助我们从一种长远的历史视角来思考这些近期的变化。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王国斌

1999 年 7 月 21 日



## 中文版前言

我的这部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对于我是莫大的荣幸。能够应邀在这篇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前言里向你们致意，对于我更是极大的荣幸。因为我是一个西方人，而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但是，后面这几点也许对于我、对于中国的读者和其他地方的读者反而是件好事。其中的原因可以用我的儿子（他是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在送给我的中国礼物上写的话来说明。这件礼物是一部新的历史著作，是哈佛大学和美国最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生前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我的儿子在上面写道：“一个观察（研究）树木的人送给一个观察（研究）树林的人。生日快乐！保罗。”的确，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只喜欢观看具体的历史树木，他们忽视甚至否认树林的存在，尤其是全球树林的存在。但是，树木是在树林里生长的，必须在树林里才能存活和繁殖。中国史学者，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中国史学者，确实往往会倾向于强烈的“中国中心论”。但是，他们的“中国中心论”主要表现为专注于中国研究或某些具体方面。他们根本看不见树林，至少看不见一个全球世界的树林的存在。

因此，即使是这些中国中心论者，更不用说几代欧洲/西方中心论者，也没有认识到，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sup>①</sup>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而这恰恰是我的这部著作所要论证的东西。正是由于我既不是只看某棵大树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只专注于中国的“中心论者”，所以我能够首先来尝试着考察1800年以前的全球经济整体，并发现中国在其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而这是以前至少在西方从未有人哪怕是费心想一

---

① 指中国。